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第二种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

—— (1840—1895) ——

上册

孙毓棠 /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等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参考资料。《丛刊》包括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工业史料、农业史料、手工业史料、对外贸易史料、外债史料、铁路史料和航运史料,凡八种,二十六册。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 严中平等编.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03-047082-9

I. ①中… II. ①严… III. ①中国经济史-近代-参考资料 IV. ①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1644号

责任编辑: 李春伶 / 责任校对: 董晓舒 刘蒙伟 王媛等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联系电话: 010-6400 5207

电子邮箱: lichunl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3月第一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88 3/4

字数: 1 316 000

定价: 6800.00元(共26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影印书除外)

#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编者 严中平 孙毓棠 汪敬虞  
李文治 章有义 彭泽益  
姚贤镐 徐义生 宓汝成  
聂宝璋 朱荫贵 等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编者简介



孙毓棠（1911—1985），江苏无锡人。中国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此后，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史地系讲师。1935年东渡日本，1937年7月肄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归国后历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教员、专任讲师、副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等职务。1945年8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聘任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客座研究员。1947年8月赴美，任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1948年8月归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9年1月起转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孙毓棠自30年代起，长期从事历史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代表作品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1840—1895》（1957）、《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1943）、《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技术的进步》（1963）、《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1964）、《清代的丁口记录及其调查制度》（1950）等。

#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再版前言

王方中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严中平先生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这套《丛刊》包括八种资料：

第一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1955年出版。

第二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 1840—1895》，孙毓棠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二辑 1895—1914》，汪敬虞编，1957年出版。

第三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一辑 1840—1911》，李文治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二辑 1912—192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三辑 1927—193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

第四种：《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共四卷，彭泽益编，分别出版于1957、1958年，1962年刊出修订版。

第五种：《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1840—1895》，姚贤镐编，1962年出版。

第六种：《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1853—1927》，徐义生编，1962年出版。

第七种：《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宓汝成编，1963年出版；《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 1912—1949》，宓汝成编，2002年出版。后者未列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第八种：《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一辑 1840—1895》，聂宝璋编，1983年出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二辑 1895—1927》，聂宝璋、朱荫贵编，2002年出版。

这套《丛刊》的编辑出版首先是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服务的。为什么要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从严中平先生一段本来是用来勉励青年学者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为了反击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的歪曲，捍卫祖国的尊严。他说：“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

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6)严先生还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了一百多年,难道就没有任何经济规律可说吗?马克思主义所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在这个社会里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这些问题,当然是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者所要探讨的。”“我们对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还摸得不够透。”(前引书,第31、32页)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为了探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摸透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

严先生这样概括他们小组在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时的工作程序:“回顾从1953年到今天这三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参考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前引书,第20页)收集资料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基础,不能搞无米之炊。

关于小组收集、编辑资料的过程,严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们小组是1953年受命搞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的。……经济史资料工作是个体劳动,我们的办法是由一位,至多两位负责一个经济部门史资料的收集和编辑工作,有那么几个人,就编那么几个部门的资料。经过两三年至四五年的工作,先后编出一批部门经济史资料的定稿或初稿,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在闹资料饥荒,为适应那种迫切需要,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只好一面学习经典理论,一面收集资料。我们理论水平之低是不需多说的,就是在资料方面,我们也只查看了某些著作和报刊,搜罗得不够广泛,至于档案,基本上没有利用。这都是我们所出资料的很大局限性。不过,我们毕竟编出那么几本资料汇编,质量虽不算高,力气却花了不少。这些资料汇编对当时的资料饥荒是起过一定解救作用的,对于我们自己,也是进行研究的一项基本功。”严先生随即补充说:“我希望青年充分注意这项基本功,对人对自己,这都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一个工作程序,轻视、嫌烦,都是不行的。”(前引书,第18—19页)

记得刘大年先生曾经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严先生领导的近代经济史编写组这种坚持从史料出发、扎扎实实的作风。刘先生认为,这套资料的编辑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一次较大规模搜集、整理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结果。正如严先生所说,这套书对当时的资料饥荒起了“解救作用”。我是1956年前后开始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当时能够看到的经济史书籍极其有限。这套资料,特别是其中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以及严中平先生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吴承明先生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就是我的入门读物。相信通过读这些书跨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门坎的人还有不少。

从这套资料开始出版到现在已过去了六十年。在这六十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版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如，《丛刊》里摘抄得很多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文集早已整理出版。1957年以陈翰笙先生为首成立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从海关档案中编译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共10辑）。最近我才知道《中国海关密档》早在1995年就已由中华书局全部出版了。还有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至少十几部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这许许多多近代经济史资料，有的是将原有资料完整地重印出来，如前两者；有的和《丛刊》一样，是从浩繁的原始资料中择要编选而成，如后者。无论哪种情况，都证明由《丛刊》所开辟的重视资料、从资料出发的道路是正确的。《丛刊》诸书所搜集、整理的资料是海量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些资料原来的出处（报刊、著作、地方志、档案、海关资料、官方文献等）现在能重版的只是极少数。正因为如此，《丛刊》中的资料还是经常被引用。编者在编辑资料时的思路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至于由编者经过细致研究，加工得出的一些统计数字就更加宝贵了。因此，我认为科学出版社将《丛刊》再版是很有意义的。

还想多说几句。1961—1964年，为编写高校文科教材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我有幸和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彭泽益、章有义诸师长以及聂宝璋、张国辉、姚贤镐、宓汝成、魏金玉、经君健诸学长在中共中央党校北院和南院之间的那两栋楼（今国际关系学院）中的北楼一块工作、生活了三年左右，真正是朝夕相处。严先生对我十分关心。这三年生活成了我珍贵的回忆。

2016年3月



## 再 版 说 明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参考资料。《丛刊》包括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工业史料、农业史料、手工业史料、对外贸易史料、外债史料、铁路史料和航运史料，凡八种。《丛刊》当年由科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研究者集齐这套资料实属不易。为方便资料的查找，在征得作者本人或家属同意后，现将《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八种，二十六册）进行再版，以飨读者。值得一提的是，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虽然初版时未冠以《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之名，但考虑到其为《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续篇，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再版时予以收入。严中平撰写的《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附于《丛刊》第一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书后，供读者参考之用。《丛刊》首出于六十年前，本身已是史料的一部分。再版时为不增新讹、便利研究者对史料的稽核以及研究者对这套史料的急需，采取了对部分（十九册）以繁体字为主的资料进行影印的方式，望读者明鉴。

《丛刊》收集资料范围广泛庞杂，既有中外文报刊、档案、笔记、函牍、奏章、条例、外交件等多种形式，又涉及英文、日文、俄文等多种文字。这些资料形成的时代也不相同，前后延续百余年。因此，《丛刊》部分章节在机构名、外国地名、人名等的翻译和数字使用诸方面与现行规范不尽相同，再版时为保留历史原貌，未做统一修改。另外，《丛刊》辑录资料或有当事人较多历史局限性的观点，均不另加注释。

《丛刊》再版过程中，无论是影印的部分，还是重新录排的部分，多有印迹不清、标点讹误，甚至辞意矛盾之处。编辑已竭力做了若干校对、修复与勘误，但限于水平，仍不免有疏漏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以便修订之用。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 1840—1895》依据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

## 序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與發展，是中國近代史裏面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近代機器工業的發生與發展在歐美資本主義各國裏都曾引起巨大的生產技術的變革和社會的變革。這種變革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後戰勝了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為社會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和勞動的大規模社會化鋪平了道路。它促使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成熟的、興盛的、統治的階段；它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關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和矛盾，進入了新的尖銳化的階段。

中國在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間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面，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入，和國內封建買辦勢力的繼續統治，資本主義不能按照一般規律正常地、順利地發展。做為資本主義生產核心的近代工業，因遭受到多方面的壓抑與阻撓，發展就比較困難、緩慢，成就也因而有限；其結果使得中國在現代世界裏曾經長期停留為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然而，中國近代工業在它數十年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中，也引起了很大的生產變革與社會變革。它標誌着社會生產力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發展，促進了新的社會生產關係的形成；它使近代中國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特殊的社會情況下，由於階級關係的複雜，在近代工業的發生與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許

多特殊的錯綜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都是重要的基本的問題，貫串在全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裏。

本書初步集錄了從中英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1840—1895年）期間，有關中國近代工業的基本情況的零散資料。這五十餘年是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時期。它的發生過程是複雜的、艱難的、緩慢的。經過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到了中日甲午戰爭時，它的成就還是很有限的。然而，它在這半個世紀的社會歷史進程中，顯然是一個新生的因素，它對當時和以後的中國社會經濟起着重要的深刻的影響。編者在這篇序言裏，打算就此時期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過程做一些簡單的綜合的敘述，以便利讀者使用這部資料，並稍稍補充這部資料的不足。敘述擬分為六個部分：一，十八、十九世紀中國手工業的基本情況；二，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三，清政府經營的近代軍用工業；四，清政府經營的採礦、煉鐵與紡織工業；五，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六，近代工業工人初期的情況。因為篇幅的限制，這敘述是很簡略的。關於許多具體的史實，仍望讀者閱讀本書所集錄的原資料，和本叢刊的其他各種資料。要敘述中國近代工業發生的歷史過程，當然不可避免地須牽涉到中國近代經濟史中若干重要的複雜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編者在這篇序言裏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見，聊備讀者參考，並望讀者指正。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的中國已經發展到了封建時代的末期。

在那時的中國社會裏，佔支配地位的、決定社會性質的還是封建

經濟。社會生產的絕大部分是農業。地主與農民是社會中基本的對立階級。小農經濟居於統治地位。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在地主階級的壓迫與剝削下，生產是分散的、落後的，生活是貧困的。在農業生產以外，爲了自身生活的需要，農民須從事各種家庭手工業。農業與手工業是密切結合的，自然經濟基本上仍佔着統治地位。當然，封建社會發展到了末期，比起秦漢或唐宋時代，農村經濟中已發生了不少新的變化。如農業技術的進步，農作物種類的增多，若干地區貨幣地租的出現，農產品商品化的加深，商業資本在農村中的活躍，以及農村對城市手工業依賴的加強等。但這些並沒有改變農村經濟的基本面貌。在全社會範圍內，封建經濟仍然頑強地佔着統治的地位。

城市小手工業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有悠久的歷史，到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已很發達。手工業業別很多，分工很細，有些種手工業的技藝已達到很高的程度。城市小手工業的生產，一部分是爲了廣大人民的需要，產品銷售於城鎮和廣大的農村；另一部分則是專爲供應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隨了當時商業的繁榮和市場的逐漸擴大，城市小手工業不僅普遍發展，而且某些行業和產品已有地域集中的現象，供應着全國以及國外市場。但是，城市小手工業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始終是以個體的獨立的小手工業者和小手工業作坊爲單位，進行着商品的簡單再生產。手工業行會在各地也普遍地存在；這種封建性的經濟組織對手工業的發展起着束縛作用。清代前期，商業資本已很發達，它在國內外貿易中，城市和農村中，都很活躍。這使得在某些經濟特別發達的地區（如江蘇、浙江、廣東）的富商們，已能進行控制小手工業的某些重要行業，存在着包買主制度。商業資

本的集中和它活動範圍的日趨擴大，早已給封建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生提供了條件。

城市小手工業以外，在各地方散在着手工業工場。工場手工業在中國歷史上從何時開始出現，它發展的過程如何，以及它在不同時期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如何，尙有待於歷史學家們仔細研究。但無論如何，到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葉，在許多地區早已有手工業工場存在。在絲織、製氈、漂染、製茶、造紙、印刷、陶瓷、磚瓦、釀酒、榨油、製糖、皮革、鍛冶、木材加工等行業中，都有手工業工場存在的記錄。這些手工業工場規模大小不同。僱傭工人人數少的只有八、九人，多的達幾百人。在製鹽業和採礦業中，也有不少類似的記錄，僱傭工人人數少的有數十人，多的如四川井鹽業，竟達數萬人。手工業工場的存在，標誌着在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確早已萌芽。而且在某些行業中，工場手工業已開始排擠或控制城鄉獨立小生產者。

根據目前所能找到的記錄來看，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葉，工場手工業雖已散在於各地，但業別還不算多；經營規模，除個別企業外，一般地還不算大；它還沒有發展到像西歐十七、十八世紀那樣普遍和興盛的程度。估計在當時全部手工業生產中，它還沒有發展到佔居支配的地位。由於封建經濟的牢固統治，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和封建生產關係多方面的束縛和阻撓，工場手工業還未能開拓廣闊的園地。然而，這些在各地區各行業中散在着的手工業工場，代表着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種新的經濟關係對於已經發展到了末期的中國封建社會，起着一定的分解作用。手工業工場的存在，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手工業與機器工業之間的中間環

節。它給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侵入的刺激和影響；但是如果當時國內工場手工業還沒有發展到一定的水平，近代工業的發生，尤其是七十年代以降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發生，將會是很困難的。

與一般民間工場手工業性質截然不同的是當時清政府經營的一些大的手工業工場。這種官府手工業在中國封建時代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在西歐中古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領主的莊園手工業曾經大大發展過。在中國兩千年來專制主義封建社會的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歷代封建政府經營的官府手工業便佔有了特殊的地位。在清代，由官府經營的手工業工場主要的有江寧、蘇、杭的“織造”，景德鎮等地的“官窯”，北京和江、浙幾處的“織染局”，為宮庭製造建築材料的各“窯廠”，沿江沿海十多處“船廠”，以及各地製造軍器、火藥的“軍械所”、“火藥局”等。這些官府手工業工場，有的規模很大，使用的工人很多，生產技術也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它們不是從事商品生產，而主要是為了封建統治者的使用而製造；它們所需要的龐大的經費全從清政府財政收入中開支。這種官府經營的手工業工場，從表面上看很像民間一般的手工業工場，但從本質上講，却具有純粹的封建性質。這種封建經濟傳統，對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近代工業發生時期的歷史有重要的影響。六十年代以降，清政府官辦的近代軍用工業基本上是和歷代的官府工業一脈相承的；而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團經營的採礦、煉鐵與紡織工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官府工業的封建傳統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使中國開始一步步淪為半殖

民地，封建經濟也日益加速地趨於解體。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一般經濟情況起了不少的變化；對手工業來講，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首先，這幾十年間外國商品的輸入日益加多，尤其是棉紗、棉布、鴉片、煤油、金屬製品、食糖等物。大量外國商品的輸入，開始破壞了中國農村家庭手工業和城市手工業，使若干地區的農民與手工業者淪於破產和貧困，使中國固有的紡織、榨油、製糖、鐵冶等手工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其次，1851年以後國內十餘年的戰爭，清軍的到處蹂躪和破壞，對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因而使得許多地方的手工業遭受到摧殘或淪於衰敗；嗣後經過了約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到1890年左右才得以漸次恢復。第三，自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以後，清中央和地方封建政府加緊了對人民的榨取，建立了厘金制度，增加了多種苛捐雜稅，嚴重地阻礙了國內商品流通，直接間接地破壞了手工業生產。這些情況對於這時期的手工業發展是不利的，使得不少地方的手工業陷於停滯，衰敗，或隣近於消滅狀態。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目的之一是掠奪原料與特產；這幾十年間外國商人從中國廉價掠取大量的茶、絲、棉花、草帽繩等物。對外貿易的逐漸擴展，促進了絲、茶等商品的生產，加速了國內農產品的商品化，同時使得繅絲、焙茶、軋棉和編草帽繩等手工業有了較迅速的發展。其次，外國資本在中國沿海沿江發展航運，運河的阻塞和中國內陸交通的頹敗，使商品運輸的路線發生了變化。交通運輸不便的地區的手工業衰敗了，便利的地區的手工業則轉趨發達了。再者，國內十餘年戰爭後，在經濟恢復的長時期間，各地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經濟落後的內地各省手工業便淪於停滯或衰敗，沿海沿

江商品市場較活躍的地區內手工業也發展得較快。這些新的情況使得某些地區若干手工業行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新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五十餘年間，一般手工業經歷了上述諸變化。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即民族資本開始陸續經營起一些近代工業的時候，手工業的基本情況，和鴉片戰爭前夕比較起來，有些差異，但大致可以說仍相彷彿。自然經濟雖然在日趨解體，但過程很緩慢，與農業密切結合的家庭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仍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城市小手工業在某些地區的某些行業趨於停滯、衰敗、甚至淪於破壞了，但另一部分則逐漸得到了恢復，而沿江沿海的地區有些行業在特殊經濟條件下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工場手工業的情況與城市小手工業的情況類似，它本身沒有什麼顯著的發展或衰縮的徵象。官府手工業則因清政府財政的困難和行政的日益腐化，顯著地呈現出衰敗的趨勢。

在十九世紀中國近代工業發生的前夕和發生的時期裏，中國手工業的一般情況大致如此。就在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發展到這樣的水平的時候，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的半個世紀裏，中國陸續出現了由外國資本、清政府官僚集團和新興的民族資本所經營的二、三百個大小不同的近代工業。這些近代工業的出現，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侵入的影響和刺激。但是在它們的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它們和中國固有的手工業的基礎不能不具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聯系。

## 二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了中國，在中國境內經營近代



工業的亦以外國資本爲最早。中國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開始發生，清政府官辦的近代軍用工業開始於六十年代，而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則自鴉片戰爭後不久便在上海、廣州等地出現。

自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之間的五十餘年，正當西方資本主義的興盛時期（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和它向其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逐漸發展轉化的時期（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這期間，資本主義各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是以商品輸出爲主要形態，它們在中國主要的企圖是逐步開闢並擴大中國市場，把中國市場捲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範圍。它們壓迫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便於進行掠奪性貿易的種種特權，強佔便於進行侵略的根據地，好把棉紗、棉布、鴉片、煤油及其他廉價工業品大量推銷於中國，並從中國廉價掠取茶、絲、棉花、牛皮等原料與特產。它們又在中國發展航運，開設銀行，舉辦郵電，圖謀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和中國封建勢力勾結，並在中國培植買辦階級，都是爲了便利和擴大這種侵略，從而把中國一步步變成爲它們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

爲了同樣侵略的目的，它們很早便開始在中國經營起各種近代工業。在這五十餘年間，它們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四類。

首先，最早的是船舶修造業。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在中國逐步攫得了沿海沿江的航行權，便大規模發展航運業。大的輪船公司，如美國的旗昌，英國的太古、怡和等，都陸續成立。出入中國各口岸的船舶也日益增多，自1865年以後三十年間，進出口船舶數增加了一倍餘，進出口船舶總噸數增